

第 1 章 怎么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大同？”

可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定的，而是中方选的。1991 年 11 月，我来到北京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请求他们：“我们想协助中国进行绿化，请给我们介绍个合适的地方。”过后不久就通知我们选择了隶属大同市的浑源县。

1992 年 1 月，我们 5 个成员来到浑源县调查。最初在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青年农民部长对我们说，“浑源县不仅对绿化项目非常热心，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出美女之地，而且有好酒”。有人会觉得这后面的话很诱人。当然，人家那么认为也未尝不可，因为我本人对此就很感兴趣。

乘坐夜里 11 点从北京站出发的列车，翌日清晨 7 点以前抵达大同站。在市内的饭店吃完早餐，便坐汽车赶赴浑源。1 月是这里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月份，月平均气温是零下 11 摄氏度。出发前在北京日本大使馆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往德国批发出口的羽绒服和毛裤，尽管全副武装，但还感觉冷飕飕的。夜晚气温降到将近零下 30 摄氏度，白天也达不到零度，如果光手去摸铁栏杆，马上就被粘住，冷不丁吓人一跳。

抵达浑源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除了冰天冻地，还有煤烟呛得眼睛睁不开。冬季出现逆温层，由于接近地表的气温低于上空，煤烟扩散不出去，空气特别糟糕。滞留在低空，感觉就好像憋在烟囱或火炕里。

晴天却看不到蓝色。大地一片黄土色，土坯房也是黄土色。无论看哪里，满眼都是黄土色。哪怕能看到雪的白色也行，可是这里几乎

不下雪。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灰土土的人民装服或者差不多颜色的棉大衣。

街头上摆卖的食品尽是“天然冷冻食品”。直径和深度有70厘米的筐里装满了鸡蛋。鸡蛋冻透了，所以才不会破碎吧。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内脏冻在里面，邦邦硬。

在我们住宿的招待所旁边有一个长途汽车站，站前的广场上有许多摊点，摊主在大白天就一口口地喝着50度以上的白酒。这白酒是御寒的好东西。摊床上铺着棉被，夜晚就睡在上面。有时还看到有小小孩儿，真让人吃惊。

尽管户外活动条件很糟，但我们还是视察了3处造林点。

最先去的是西留乡龙首山的造林项目点。这里是黄土丘陵地带，种有松树和杏树，直到前年这里还是一片田地。可是，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陪同前来的县林业局长温增玉把土扒开，里面露出了一棵小小的松树苗。为了抵御冬天的寒风，用土把树苗埋了起来。

然后我们来到乡政府谈话，在场的男人们个个儿面部表情严肃，脸子拉得很长，一副顽石不化的样子。我们围坐在会议室的煤炉旁，忍受着对面射来的目光。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开口说话了。

“村里的庄稼产量提高了不少，所以有余地可以考虑环境问题了。盖新房少不了用木材，所以想种树。”

又说：“现在种上树，50年后，100年后肯定长得特别好。”

他们这么说也不足为怪。日本也好，中国的城市也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谁也说不清50年、10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即使说5年、10年后的事情，也会遭到周围的白眼。但是像这种地方的农村，即使和50年前相比，也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对方即使说50年、100年，也很自然地能够让人接受。我听了这话，莫名其妙地一阵感动。



图：最高气温零下 10 摄氏度，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推车上的鱼和肉冻得邦邦硬。（浑源县，1992 年 1 月）

第二个项目点在北岳恒山的南面。恒山是中国的五岳之一，道教的圣山。不仅国内游客，来自海外如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也到此参拜，人数年均达几十万之众。参拜道路附近种有大株的松树。陪同我们的人说：“尽管山南面比北面难度大，但是这里游客多，所以有必要绿化。”

第三个项目点南邻灵丘县，是一座叫银洞梁的山，离县界很近。1989 年栽种的落叶松已经三年，长有一米高了。

这三个造林点好像都不错，但最终还是决定对前两个项目点给予合作。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两个点的项目结果彻底失败，而没看好的落叶松反而茁壮成长。

在摸索中起步

1992年1月，在调查团出发去当地之前，成立了绿化合作项目的筹备会。深尾叶子（现任大阪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女士说：“今后是网络时代。”具有理事资格的佐野茂树说：“名称最好不要太死板，比如说叫‘绿色地球’什么的。”于是我们把两者合一，决定叫“绿色地球网络”。

说开始倒是容易，可是既无资金，也无组织，也没有绿化、植物方面的专业人才，有的只是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和对绿化的热情。况且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做不到位的人。

在浑源县参观三个造林项目点时，看见树苗基本都扎了根，也没有枯死的，心想：应该问题不大，就从这里开始吧。中方也不会给我们看糟糕的项目点，再说我们也希望马到成功，所以也就没抱任何怀疑。

那么，起步时确定什么样的内容、多大的规模为好呢？这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财团法人“绿色地球防卫基金”在此前不久开始了在陕西省韩城市的绿化合作。时任事务局长的柳田耕一是我以前的酒友，他曾对我说过“合作搞绿化在中国颇受欢迎”。我想到搞绿化项目，也是受他的启发。他们的项目经费每年为10万元人民币，签约提供10年。

我把此事介绍给大家，向调查团成员提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暂定标准。按当时的汇率折合260万日元。如果真想干，筹集到这个数目基本没有问题，但是连续提供10年，把握可就不大了。因此，决定先设定为一年。我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作为购买树苗的经费提供给西留乡的龙首山和恒山南面的造林项目。

在浑源县最后的那天夜晚，我们和中方人员在恒山饭店的一个房

间开始了磋商。当时只觉得很紧张，心想：匆忙上马的项目，基础又薄弱，如果起步就马失前蹄，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从来没和国外有过什么合作的经验，中方也很紧张。中方由共青团浑源县委书记李启军宣布中方的决定，也可能是紧张的缘故，只见他一个劲儿地直舔嘴唇。正当这时停电了，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漆黑。点上蜡烛以后，会议在烛光下继续进行。

“我们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当李启军书记念完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以后，我们又赶赴省会太原，走访了林业厅、绿化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等有关政府机构。在太原，我们和山西省青联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们对在浑源县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横加指责。当时全程陪同我们一起活动的人转达了此事。

我们问：“签协议时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到现在才说。不行！”

可是她竟说什么：“那时你们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呀。”

她没当场提出来自知理亏，因此也没再说什么就回去了。可是她并不罢休，一来还是那一套，反反复复几次。她还满不在乎地说：“只要按我们的意见修改，下边的事我们会摆平。”对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能容忍的。我想，这可能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上面的意思吧。

为了不给当地造林点添麻烦，我们出钱做出适当的让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后在做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交换文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在大同，除了实质性的文本以外，诸如合同之类，一概不做。此类文本一出，有责任感的一方反而被套得牢牢的。既然如此，还是没有为好。

在初期阶段，所谓互相信赖关系，可以说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认为互相坚持各自的主张有什么不好。但是，过后的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打那以后，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再三要求我们在去当地农村之前一定先去太原。也许他们觉得项目如果选在自己够不着的地方不好控制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考虑。我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而太原的干部又不了解农村，我们双方在一起高谈阔论，你想想，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以石原忠一顾问为团长的第一次绿化合作团在 1992 年 5 月黄金周期间访问了当地。该团迫不得已选择了太原→五台山→大同的路线。前来陪同的山西省青年联合会的干部一个劲儿地向石原团长灌输着“黄河流域的绿化最重要”的观点。山西省青年联合会的重点课题是黄河沿岸的绿化，而我们选择合作项目所在地的浑源县不属于黄河水系。



图 这是我种下的第一棵树，没过多久就枯死了。左边是顾问石原忠一（浑源县，1992年5月）

“日本鬼子”

从1992年9月开始，我在大同的农村逗留了70天左右。本来我应该让青年联合会发邀请，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乘坐神户开往天津的“燕京”轮，在船上申请办理了签证。对山西省和大同的共青团，只告诉了我的到达时间。

大同的农村几乎都是未对外开放地区，所以我的活动除了签证以外，还需要外国人通行证。可是当地只给我准备了一星期的有效证件。过后，有关人员告诉我：“怀疑你在农村待那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像我这样傻呆呆的人，能当间谍就好了！总之，双方还是互不信任。10年后的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数不胜数。

一个人出行最让人头疼的是诸如排长队买火车票的时候。放下行李也许就会被顺手牵羊调包儿。但是，装着好几个月的生活用品的行囊老背在身上，非常难受。到了大同，住大同宾馆的多人房，虽然没有什值钱的贵重物品，可是摄像机要是不翼而飞，那可就麻烦大了。所以，哪怕是稍微离开一下房间，都觉得心里不踏实。

一个人出行另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是吃饭。越便宜的饭馆给的菜量越大。一盘菜都吃不掉，而只点一个菜又觉得有点单调。吃得最舒服的是小摊儿做的面条。

“今天晚上改善一下吧，给我放两个鸡蛋！”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看能不能创下一天花钱最少的记录。

我的中国话只能讲几句寒暄话。如果跟中国的老朋友打招呼，会有人陪我去的，但是在我开创新事业的时候，还是想靠自己解决。

一路上摸爬滚打，终于来到了最初项目合作点的浑源县西留乡，住在了乡林业站负责人刘天文的家里。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共青团副书记王有全陪同了我。

那段时间过得很是悠闲。有时帮助老乡下地收割玉米、葵花子，有时用摄像机拍摄宰羊开膛的情景，有时悄悄地去看人家结婚，和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的现在大不相同。

过晌时分，我在西留村正溜达，听到了一声叫喊“日本鬼子！”这里所说的“鬼”，并非日本人概念上的那种骇人勇猛的鬼，而是凄惨可叹的“死鬼”。循着声音看去，可能是从中午就一直喝着白酒的缘故，几个喝得满脸通红的老乡正靠着土墙在地上坐着。

干脆装作没听见溜走吧，我心想。没有上杆子自讨苦吃的。可是转念一想，开始就逃跑，以后自己就会养成逃跑的毛病，那样的话，在这里开始的工作就会半途而废。浑源县在日中战争中是中方的战略据点，许多村庄都有牺牲者。

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们身旁，拿出香烟，递到他们眼前。坐在中间的一人伸手接过。我用一次性打火机给他点上火，心里踏实下来。我坐到他们旁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帮助你们村搞绿化，你们反对吗？”

“是吗。原来这事儿不是瞎说的呀。刚才我还骂了你，不好意思。你不是鬼子，是日本人。”说完，又说：“不到我家去坐坐？”

我又鼓起勇气，跟在他的后面走去。钻过土墙门，走进一栋破窑洞，然后上炕。

怀里抱着一岁大点儿的孩子、脸色苍白的妻子拿来白酒和粗糙的饭菜直接放到了炕上。可能是昨晚的剩菜吧。我也没客气，端起酒来。对方的汉子也喝起来。

汉子开腔了：“这村的干部都不怎么地，腐败透了！”

我接着话茬，问：“今天我住刘天文家，他怎么样？”

“刘天文……他可是不错，和我的关系没得说。”

语言不通，又喝得懵懵懂懂的两个醉鬼，翻来覆去说着车轱辘话。

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你说你完全不懂中国话，怎么能说到这个份儿上？其实，只要有时间垫底，对方的意思基本能揣摩出个大概。再说对方老是缠着你不放，直到认为你听懂了，才肯罢休。

天擦黑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刘天文家赶。他家门口聚集着一堆人，只见刘天文从人群里蹿出来，冲我大叫：“你跑哪里去了！”午饭以后，我跟谁都没打招呼就出去了，寻不见我，大家正着急呢。

“我呀，到你好朋友那儿喝酒去了，结果喝高了。”

“什么？我的好朋友？谁呀！”

“就是他，那边那家。”

话音一落，刘天文往常那副温厚的表情顿时阴沉下来。好像我说的“好朋友”那句话惹他生了气。想来也是，日本人再怎么可恨，也不至于当面就骂人家“日本鬼子”呀。还是有点不正常。再说，哪有跟刚认识的外国人一见面就说“村里的干部都腐败透了”，确实有点儿过分。

可是他（我连他的名字也没记住……）对我来说可是个“好老师”。如果没有那次应战，也就没有现在的高见了。那次经历壮了我的胆儿，我在农村再也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从这件事中我还体会到了应该如何去判断别人说的话，它关系到怎样去了解情况和做调查。对方说的话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不动脑子经过验证，了解的东西就往往大打折扣了。

温增玉夫妇

在造林项目活动初期，有几个人让我难忘。首先就是温增玉。当时他担任浑源县的林业局长。1992年1月，当第一次调查团在西留乡问他“最希望我们这些日本人做些什么”时，他只简单地答了一句“希望坚持友好”。关于绿化，他说：“那是我们的工作。”话里话外，好像在说：你们日本人能干什么呀！

从北京和太原来的翻译都很喜欢他。他们知道交涉幕后的情况，跟我说“真正认真考虑绿化事业的只有咱们这位林业局长。在中国，这样的人被称为人民公仆。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在中国，作为对年长者的尊称，往往在姓的前面冠上“老”字，而在前面加一“小”字，则是对年轻人的爱称。我和“老温”开始亲近是在1992年秋天单独一人在大同农村长期蹲点的时候。起初，县里的团干部一直陪着我。可是，年轻人没长性，没过多久就烦了。我又不会说中国话。即使跑农村也就是看看造林点和村子里的情况，照照相，拍拍录像。整天陪着我这么个中年人转来转去，不烦才怪呢。结果，以后只要一进村，他们就马上钻进哪家，不是忙着搓麻，就是敲三家，哪还顾得上我呢。再到后来，干脆连跟也不跟来了。

一天，我和共青团的干部在县城里遛弯，碰巧遇上了温增玉，只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原来车子放炮了。老温冲着团干部不客气地说：“日本人来，你们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因为是共青团接待的，和林业局没关系。”

“可他是我的朋友，你们当然要告诉我。”老温气得满脸通红。

我得知，老温的家就在我住宿的招待所附近。那以后，我每天早晨去他家里。有的县局长级别的干部配有专车，住的房子也很豪华。可是他家住的是极简陋的民房，生活也很简朴。早饭基本上是小米土豆粥和腌白菜。每天都是如此。

我每天去他家，而他家每天早晨都有客人来访。一大清早就登门来商量各种事情，看来他很受人信赖。

“老温，今天你有什么日程？”我问。他要说“开会”，我立马就打道回府，设定自己的计划，或者骑上从招待所借来的自行车到附近的村里转悠，或者干点儿其他什么事。这个“会”呀，实在是多。听说过去中国农民有两怕：“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可见共产党的会议之多。可最近也有人说：税也不低！

只要他不开会，我总和他漂在一块儿。车子是军用吉普车，全身红色，车身上漆着“森林消防”几个大白字。只要车子一进村儿，很多人便聚集过来，亲热地冲着老温笑脸相迎。我也跟着沾光，心里很舒服。听说老温年轻的时候当过人民银行的会计员，又曾先后担任过4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后调到县林业局，最后当上了林业局长。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以后被恢复的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取而代之。老温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农民对他都很亲热。

浑源县有28个乡镇，我跟随老温走过的乡镇起码有一半以上。他领我走访各处的森林和果树园，告诉我树木的中文名称。当他说出树名时，我就问是哪种树，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告诉我。

一个村子，哪怕只去过一次，也会留下深刻印象。至今我对浑源县也能在脑海里画出大概的地图。树木和植物的名称也记了不少，其中不乏好多是先知道中文名而后才知道日文名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山沟里的好多村子在战争期间因为顽强抵抗日军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因为游击队一直以贫困的山村为据点与盘踞在县城里的日军展开拉锯战。

老温和我都爱喝酒，老温的司机更是了不得。吃午饭时，花两块块钱买来散装的一斤白酒。酒有53度。老温把酒一分为三。我说不行，太多了，老温就把酒倒给司机一些。司机毫不在乎，下午照常开车，路再不好走也不耽误。

“汽车喝油，司机喝酒。”听着我这蹩脚的中文，三人开怀大笑。到了11月，山里开始下起雪来。雪花落在我的膝盖上，可是车

门是关着的呀。原来吉普车门关不严，嘎嗒嘎嗒直响。

如果回招待所晚了，经常不去林业局，直接回到老温家。每到这时，老温就拿出烟和白酒，犒劳司机。老温的老伴儿叫郭玉香，她在路旁一间土坯房开了个小铺，经营着烟酒和油盐酱醋。依我看，卖出去的远不如老温随意拿来犒劳大家的東西多。

过了一阵子再来的时候，小铺已经不见踪影，被一家电器修理店取而代了。温夫人高兴地说：“租给别人，一个月还可以赚 80 块钱的房租。”

“这么说，以前连 80 块钱都没赚到？”我问。

回答更是令人拍案叫绝。“赚钱？打开始就没想。老温的朋友多，我们也高兴，老温又一直愿意犒劳大家，所以干脆开个铺，这样，成批进货比买零售的便宜。”



图 浑源县林业局长温增玉夫妇。我每天到他们家里吃早饭——小米饭和土豆。

她有时在店铺的里屋和小伙子们一起打麻将，钱数倒不大。要是没有这个胆量，也不会接受我这样的人来家。

老温的地方口音很重，听起来很费劲儿。温夫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处的关系如此亲密，可是语言上的交流却无能为力。

温增玉夫妇给我的印象极深，零碎的记忆尽管很多很多，但是要用语言把它们组织起来却是难事，让人干着急。

我最遗憾的是，老温在退休前得了胆囊炎，不能喝酒了。

“来，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干杯。”没想到这话也反复说了二十多次，不过在他退休以后，每天有许多朋友跟他在一起，过得蛮不错。温夫人在 2001 年春天患了脑溢血，不知道那以后过得怎样。

我们受到了监视

2002 年 12 月，我去看望了老温。好久没见面，很想听听他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我相处的。

因为事先打过招呼，温夫人正在房前等候。虽然左半身行动有点儿不利索，但是不用拐杖也能自己走。有些发福，可是说起话来和从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至于说的什么，还是一点儿没听懂。

对我的提问，老温答道：

“你高见，好人一个！有一次，我们只带了干粮和水，一起到山里去。因为途中耽搁，回到县城的时候，食堂已经关门了。没办法，只好把你领到家里。见你高兴地把饭菜一扫而光，打那以后，我就让你每天早上到我家里吃早饭了。

“走访农村时，了解到有很多村子曾经遭到日军的烧杀掳掠。每到这时，你脸上都会现出十分惭愧的表情。虽然你没有直接的责任，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承受着这些。看得出来，你想为死难者的后代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做事很投入。每转一座山，你都要看看土质，详细询问那里的海拔有多少？降雨量多少？长的是什么树？夜里回来还要研究，做记录。发现漏掉的问题，第二天再补问。不仅特别认真，而且抱着科学的态度对待工作。”

这些话虽然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但因为是老温的看法，所以只好照原话转录于此。

可是突然，老温话锋一转：“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道歉。”

什么事呢？

“当初你们5个人从日本来大同，在恒山饭店举行了座谈会。当时出席会议的县长指示我们说话时要做到内外有别，来的是日本人，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以后的责任就落到我头上了。因为以前没和日本人打过交道，所以很谨慎。心想，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难道真是为了植树吗？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他们不会趁机调查地形，调查道路，探问军事情报吧。总之，心里直犯嘀咕。

“所以，开始那段时间只领着你去和项目有关的地方。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明白了你们确实是为绿化的目的而来，所以领你们去的地方也逐步扩大了范围。”

噢，原来如此。也真难为他了。想来会议多的原因，并非只是个托词，实际上是不方便带我去各处吧。

“经过两年时间一起工作，最后我得出结论。日本人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绿化。中国的环境变坏了，日本也得受牵连，你们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想法，我终于理解了。”

受到如此监视，感觉迟钝的我竟然毫无察觉。只认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我老缠着他寸步不离。而且我是个酒鬼，一喝醉酒就把不住嘴巴，

什么秘密也保不住，马上就在脸上显现出来，就这样哪还当得了什么间谍！不过自己的天真无邪，却帮了我的大忙。

“你们想要地图，我说没有，其实既有一万分之一的地图，也有航拍图像，但是我没有给你们看，心里过意不去，但是现场我基本都带你们转过来了。

“你们干得确实不错。一切从零开始，不仅合作项目扩展到如此规模，而且理解你们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呀，打心眼儿里高兴。”

让老温这么一说，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起步阶段无缘与老温相遇，恐怕我也难以坚持下来了。可是，我竟然被严严实实地监视了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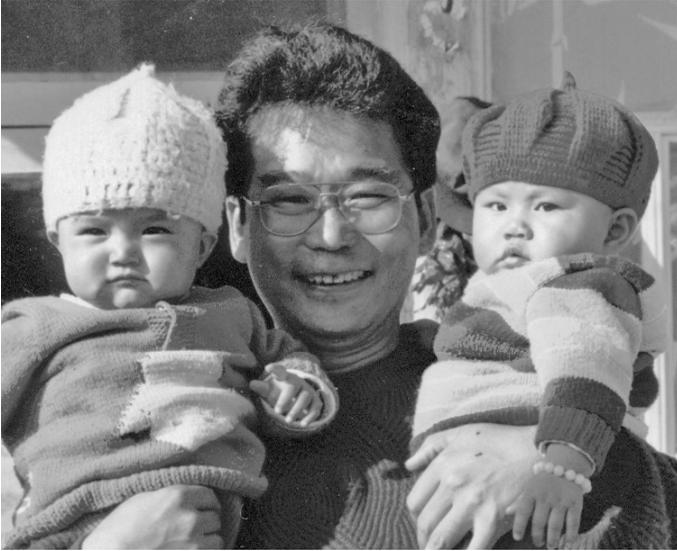
黄土高原上的娜乌西卡^①们

在我家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不大的塑料镜框，照片上，我左手一边抱着一个一岁半左右的女孩儿，犹如“双喜临门”，我笑得合不拢嘴。记不得是谁给照的了。我夫人很喜欢这张照片，于是就摆到了桌子上。最早那几年我也照过不少小孩的照片，但现在即使见了面，恐怕也根本认不出来了。

那时，中方的合作伙伴并不能完全依靠。我语言不通，怎样才能深入农村呢？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自己是能琢磨出办法的。我采取的战术是把孩子作为突破口，和孩子交朋友。尽管我知道用“战术”这个词表达不太恰当。总之，先和小孩子们搞好关系，好事会随之而来。

最重要的是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不要居高临下俯视他们，而是要

^① 日本宫崎骏编剧导演的故事片和漫画片《风之谷》。风之谷为一国名，娜乌西卡是风之谷国酋长的女儿。风之谷有着良好的生存环境，可附近的地区都被沙化或遭到邪恶孢子侵袭，于是娜乌西卡肩负起拯救风之谷和保护村人的重任。——译注



把视线和他们的视线高度拉平，或低于平视高度。不能吓唬他们。在孩子们做游戏时，我就蹲在旁边，注意距离不能太靠近，四五十分钟一动不动。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能让他们注意到你，又不至于影响他们做游戏，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他们习惯了，你不妨再往前凑一凑。

乡下的孩子腼腆，习惯陌生人需要时间。操之过急，孩子们就会一溜烟儿跑掉。有时也可以借用小道具的手段。但是，给他们照当场成像的照片，显然是邪门歪道。因为一旦形成介助物质的关系，那么就很难更深入进去了。

总结了经验以后，我决定从小学校开始入手。我访问老师，并做自我介绍。诸如握手、拥抱互拍后背之类，即使稍有夸张也无所谓，为的是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和他们的老师关系是多么的亲近，这样就可以缩短你蹲在孩子们旁边的时间。因为孩子们和老师的距离很近，所以这层关系很管用。

孩子开始拉你手了，就等于“鱼上钩”了，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行



无阻了。

“这是小学校。”

“那家有条狗很凶，注意离它远点儿。”

“这家的老爷子很固执。”

“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話，到我家去吃。”

家长看到孩子亲热地领着人来家，自然也就不会慢怠客人了。这样，我就时而蹭上不错的一顿饭，甚至有人家为我宰了一只羊。

不是有很多拍摄的贫困农村看着觉得可怜的小孩照片吗？我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存在，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根据摄影的角度不同，照片给人的印象也会发生变化。从上面往下俯拍，就好像感到小孩在翻着眼珠偷着往上看，惨兮兮的、好像跟人要东西似的。因此，如果心怀歹意，是完全可以拍成这种情形的照片的。

我也跑过不少处贫困乡村，但所看到孩子都很活泼，有生气。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贫困。这很自然，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别看

他们小，但很有自尊，第一次见面给糖果，他们不会伸出手来。相反，他们好奇心很强，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你。

父母们总是自己舍不得吃，而尽量让孩子们多吃。越是贫困的地方，家庭的亲情意识就越强，给人的感觉也很纯洁。

我和乡下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弯下腰，或者坐到地上，那是因为喜欢观看孩子们可爱的表情。作为生在贫苦百姓家庭的次子，我这样做，也是在重新审视着自己。

问我为什么给本节小标题起这样的小标题？早期参加绿化合作活动的成员上田信（立教大学教授）和深尾叶子经常说黄土高原和“风之谷娜乌西卡”的世界一模一样。昌盛的文明破坏了环境，千年后变成了娜乌西卡的世界。黄土高原也是如此，是大文明繁荣过去一千年、两千年以后的世界。

“高见”我的中文名字

在大同，大家叫我“Gao Jian”，直呼其名，因为当地中国人之间也这么叫。我以为叫我的名字是“高见”，可是到村里访问时见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热烈欢迎！高健先生”。他们把“高”当作我的姓，把“健”当作我的名了。“高”姓人家在这里非常多，“见”和“健”在中文里同音。

不仅村里人这么认为，在四五年前当地报纸刊登有关我的报道时，上面也是写着“高健”，撰稿人竟是中方绿化合作项目的成员杨元胜。最近收到老朋友温增玉的来信，收信人名写着“高建”。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演员是高仓健。但是“高仓”是姓，“健”是名。但在中国“高”被当成姓，“仓健”当成名了。这么一来，我们就变成一家了。

“Gao Jian”是我中文名字的发音。1971 年以来，虽然多次访

问过中国，可是中文一窍不通。因为每次都有翻译陪同，所以没有必要讲汉语。

1992年9月开始，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在大同的农村逗留了70多天。那时我的中文水平也就是会说“你好”“谢谢”“再见”“厕所在哪里？”之类的程度。

不过，反而更好。不懂中文，我就得争取多去现场实地考察，了解真实。一起去过现场以后再听人谈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此人的可信程度。拿植树成活率为例，比如自己过目的树已有一半以上枯死，乡长却介绍有90%成活。那么这个人的话只能打对折。长此以往形成习惯，总是先去现场。

更方便的是，不懂语言，就不会为谎言所骗了，对方也不会去骗你了。总之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让你高兴，哪怕仅在这个场合，拣你爱听的话说。有的人亲切过分，甚至连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教给我。我此番讽刺话结果遭到了朋友王黎杰的反唇相讥：“日本人不是那样吗？在大阪问路时曾经挨耍了。”

看来无论哪个国家，对外国人都很热心吧。

语言不通，使得其他感官敏锐起来。和乡干部在一起走路，碰上村里人，从农民刹那间的表情可以判断出，“噢，这个干部在村里的人缘不怎么样”。这瞬间的印象，往往八九不离十。

我为不懂中国话大言不惭列出这么多条好处，中文自然也就不会有长进了。

即便如此，在只讲汉语的生活环境下，我还但是不知不觉地就能听懂了，让人不可思议。自己记得好像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年秋天，我在大同逗留了50多天。一天，我们去大同一直往西的芦芽山考察天然林。途中碰上当地老乡问话，对方说的基本都懂，而且我回答也用了汉语。

从大同跟来的团干部都感到有些奇怪。

“高见，那老头儿的话连我们都听着费劲儿，你怎么能听懂呢？”

当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对方的话语先输送到大脑形成印象，回答自然而然也就出来了。

抛弃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虽然我已经掌握了一些中文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我决定抛弃它了。为什么？当然事出有因。随着大同合作项目的迅速发展，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已经根本不够用了。

我是通过一件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无论你有过什么样辉煌过去，上了岁数身体出现故障时，都要住院，或到疗养院养病。此时就会受到年轻的护士或者医生像哄小孩儿似地对待。“老大爷，你这是怎么啦？”结果越发不愿意回答，形成恶性循环。

不幸的是，我的合作对象是共青团。虽然他们都很精明强干，但缺乏基于实践经验的想像力。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付，不知不觉就被当成小孩子了。我想表达自己的意图，罗列几个残缺不全的单词，结果反遭取笑。

“高见，这是一豆一腐一”

“豆腐谁还不知道！”我不客气地回了一句。我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如此下去，不仅建立的正常关系受到影响，而且不知何时，我自己就会火山爆发。

1994 年春天，我请王黎杰做翻译从北京一起去大同。我和王黎杰认识已经 20 多年了，因此互相知根知底，不必客气，感觉真是轻松。除翻译以外，好多时候我还请她帮着出主意。

我向王黎杰诉说被共青团的人当孩子耍的事，她说：“何必为这事苦恼，以后有需要，尽管说好了。”从此以后，王黎杰每年都去几次大同。大同方面也都叫她“王老师”，开始依靠她了。

“绿色地球网络”的顾问小川房人是驻外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听说他是著名生态学者吉良龙夫小组的干将。他说：“外语这东西，要么就干脆一点儿也不会，要么能达到和人家吵架的水平，除此之外，其他都没用！”

不错，不愧是高手！

他有一次要和所在国的政府去交涉，对方说“不行”。他马上装傻：“是吗，今天不行，那我就明天去。”“明天不行。”“那我就后天去。”小川说：“不管什么棘手的问题，基本上去 8 次就会解决。”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 1995 年春天开始，祁学峰开始尝试在大同培养翻译，选定了 1990 年期间曾在日本的埼玉医科大学研修过一年的护士王萍。从此，她开始一直跟随我做翻译。她的日语进步得很快，相反，我的中文却是节节败退，每况愈下。